

2

商业企业管理参考资料

商学院商业企业管理系编

目 录

1. 认真学习陈云的经济论著 邓力群 (1)
2. 认识我国国情的一些参考资料 (12)
3. 国营三级批发企业管理条例 (试行)
..... 商业部 (17)
4. 中国百货公司系统一级采购供应站经营管理
条例 (试行草案) (37)
5. 认真学习湘乡经验, 进一步提高批发企业的经
营管理水平 阎 敏 (93)
6. 我们是怎样实行统一领导、专业划细、分部核
算、定额管理的 湘乡县百货公司 (102)
7. 谈谈对三级批发企业实行“统一领导、机构划
细、分级核算、定额管理、百分计奖、按劳分
配”管理制度的一些认识 朱亚芳 (118)
8. 关于改进商业批发机构调整二级站的通知
..... 商业部 (132)
9. 略论商业二级站的地位和作用
..... 万东、丁戈 (135)

10.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邱清基 (139)
11. 实行奖励制度的作用和条件万显杨 (145)
12. 关于劳动力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156)
13.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动力问题研究
.....刘明夫 (159)
14. 价格工作中应当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卓甫 (171)
15. 关于改革商业物价管理体制的一些见解
.....艾中全、刘世远 (175)
16. 改革物价管理体制的初步设想
——物价总局刘卓甫、季龙同志在体制小组
座谈会上的发言 (摘要) (182)
17. 商业体制改革应从搞活市场起步
.....江洪其、黄学忠 (192)
18. 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辨议杨德春 (202)
19. 当前农副产品流通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刘福园、纪宝成 (215)
20. 建国以来农产品收购政策的演变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研究室 (223)
21. 国家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管理经济合同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
..... (242)
22. 试论商业经济合同的性质和作用陈子亮 (246)

23. 从天津市一级站流动资金的变化看商业批发体制的改革天津市财政贸易委员会调研室 (254)
24. 论商品流通费用侯善魁 (265)
25. 努力降低农副产品的流通费用杨方勋 (278)
26. 企业的经济核算和经济效益季崇威 (281)
27. 我国商业资金周转速度同日本的比较
.....陈大鹤 (315)
28. 按照流动资金运动规律的要求管理商业流动资金刘恩禄 (329)
29. 搞好市场预测的几个问题 (341)
30. 关于我国国内市场预测的内容和方法的探讨
.....叶树滋 (345)
31. 预测方法简介张楠编译 (366)
32. 怎样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
.....刘晓林、王昭文 (375)

认真学习陈云的经济论著

邓力群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

读过陈云同志经济论著的同志，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三十年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意见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的。按照他的意见去办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能够搞得好。过去我们有时候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事，有时候就把他的意见丢在一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吃了不少亏。所以，今后要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搞好，还是应该遵照陈云同志提出的原则和主张，结合新的情况去执行，在执行中加以发展。这样，就有信心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更好，就可以避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

最讲究实事求是 按国情办事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我们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因此，研究扩大再生产的理论问题，就不能不联系到商品经济的规律、范畴，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手段。这个问题，我国的理论界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已经讨论了多年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也有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斯大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这本书里谈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

论有对的方面，也有错的方面。正确的方面，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曾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不正确的方面曾经使我们的头脑受到束缚。但是应该讲，在一个时期内，这种消极的影响，在中国还是受到了限制的。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正式评论过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里不起作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但是陈云同志实际做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同斯大林的理论不相同的，甚至于可以说，同斯大林的这种理论是相反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苏联的社会条件不同。解放初期，我们只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但是，民族资本照样允许存在，我们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大量存在，除了在国营经济内部实行生产资料调拨这一点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以外，我们都是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这就跟斯大林不同了。当时，国家直接计划的范围还比较小，国家能够直接计划的只有国营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还只能实行间接的计划；对于大量的农民个体经济，还只是实行统购统销。这种情况，同斯大林发表那篇著作的一九五二年的苏联是很不相同的。陈云同志最讲究实事求是。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办事，因此采取的政策就必然同斯大林不一样。这就是陈云同志讲的“不唯书”。书是要读的，但不是拿书本生搬硬套。举例来说，在解放初期，我们的棉花很不够，要进口。在旧中国，我们都知道所谓“美棉”，蒋介石每年大量进口。在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就采取了提高棉价的措施，一斤棉花的价钱等于八斤粮食的价钱，棉花的产量很快就上去了，不但能够自给，有一个时期还能够用自己的棉花加工一部分纺织品出口，这就证明，陈云同志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的，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不能够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

只能调节流通、调节市场。解放初期，上海有些资本家进行捣乱，进行棉纱投机，对物价的影响很大。陈云同志经过调查，搞清楚了在市场上进行投机的棉纱是多少万件，就确定了一个政策：私营纺纱企业必须卖给国家多少棉纱。国家手里掌握了棉纱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棉纱的投机一下子就制止了，棉制品的价格也就稳定下来了。他把经济规律和行政手段互相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搞粮食、油料、棉花的统购统销，工业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等等。虽然是行政措施，可是这些行政措施是考虑到了商品经济的要求，考虑到了价值规律的要求的。

最近，赵紫阳看了陈云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篇文章，很有感慨地说，我们现在经济改革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当时陈云已经提出来了。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提供了扩大计划范围的条件，国家直接计划所占的比重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对我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就更清楚地暴露出来。陈云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有一篇很好的讲话，提出了以国营市场为主体，以国家领导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补充。最近赵紫阳同志看了这一篇文章，就很有感慨地说，这篇文章是陈云一九五六年讲的，但现在我们在经济改革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是当时陈云同志已经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有不少都是陈云同志在一九五六年要求我们做的工作。斯大林不准把生产资料（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大型农具）卖给集体农庄。毛泽东同志突破了斯大林的框框，主张农业生产资料可以而且

应该卖给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一九五八年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谈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特别让大家注意斯大林说的这两段话：“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上，批驳了陈伯达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的主张，说有的理论家读书的时候有马列主义，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的马列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中出现了一种偏向，说毛泽东同志对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有什么贡献？他不过是说了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说过的话。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同志那时候叫我们读斯大林这本书，批驳陈伯达，而且说，能够接受陈伯达这种观点的，在我们党内有几十万个干部。如果不纠正这种偏向，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联系一九五八年的实际情况来讲，毛泽东同志运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对于我们克服当时那么严重的危险，它的现实作用，它的极大的历史作用是不应该低估的。后来毛泽东同志讲过，要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说，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绝对不能不严格遵守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还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这些论断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编了一本《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精选一下；原书有四十五万字，现在摘编成为近十万字，还有几篇比较通俗的介绍。这本书，搞经济工作的人应该好好读。但是，这本书比较难读一点，可以先读那些介绍；读了介绍以后，再来读这个摘编，而且要同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互相结合起来读。

读《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这本书，要同陈云的经济论著结合起来读

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我们的社会生产过程，就整体来讲，是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没有流通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就没有结束，再生产就难以进行。可是，我们过去对流通过程的问题注意得很不够，以为生产就是一切，产品生产出来了，任务就算完成了。搞工业的同志，相当多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生产；生产出来以后是不是在市场上能够卖得掉，可以不管。因此，市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搞生产的人很少考虑。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企业管理不算好，现在我们重视管理了。有个日本学者说，你们重视管理是很对的。可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如果只讲管理，不讲经营，还不可能有很大的进步。他说根据日本的经验，经营和管理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所谓经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企业战略方针的决策。例如，根据市场预测来决定产品的方向、生产规模等重大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能够卖得出去，而且能够很快地卖得出去。因此，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就要经常了解市场的变化，了解别人同你竞争的情况，提高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等。这样，就必

须千方百计地加快资金的周转和循环。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生产出来，只有卖掉以后，产品中的各个部分才能够得到补偿和实现；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就是产品到市场上出售了以后，作为一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然后再开始下一个生产过程。每个企业的资金都要经过货币资金——商品资金的循环，并且按照一定的比例，处于这三种形态之中。这三种形态的资金，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在时间上是先后进行的，而且要及时改变原有的形态，采取新的形态，资金的循环才能够正常进行。这种循环如果不是当作孤立的行动，而是当作周转的过程，就是资金周转。周转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总和。缩短周转时间，加速资金周转，是经营决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市场问题，对于生产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重商主义者认为，价值是在流通领域创造出来的。马克思讲，这个观点不对，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但是，马克思接着说，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必须到流通过程才能够实现。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实现的问题。列宁说过，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他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直截了当地叫作“实现论”，就是价值通过市场实现。“实现论”不仅要研究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在价值形态上如何实现，而且要研究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在实物形态上如何实现。第一部类内部的交换，第二部类内部的交换，以及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交换，都必须通过市场。重视市场，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也就是重视实现。我们不能只靠生产，不管实现。如果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创造出来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不能够实现，就会白白地浪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我们的同志，除了搞财贸工作的同志以外，有多少人是重视市场问题的人呢？搞生产的同志有多少人是重视市场问题的呢？恐怕不很多。当然这和经济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按照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消费品生产出来以后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如果货不对路，或者生产过多，就积压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如果生产少了，供不应求，造成脱销，就让消费者在商店门前排队等候。这些压力都压在商业部门，我们工厂可以不管，生产资料生产出来以后由物资部门统一调拨，需要的时候就向物资部门申请，这也常常造成货不对路，造成积压或者脱销。这种经济体制是受到斯大林的理论的影响，人为地把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割断了，造成了管生产的人可以不关心流通，管流通的人也可以不问生产。

这套体制和办法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经济很难搞好，我们的企业也很难进步。因为斯大林说过，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够进入流通领域，要实行调拨；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在生产领域不起作用，在流通领域也只限于消费的产品。我们过去学习苏联，受到斯大林式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

陈云认为，市场商品供应情况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陈云在六十年代初所提出的一些措施，使生产和流通互相衔接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原理的运用。

陈云同志没有直接地批评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但是他的工作，他的主张，实际上是突破了斯大林的一些框框的。对于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陈云同志实际上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陈云同志一向重视商业工作和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市场商品

供应情况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如果市场上的供应年年紧张，那就不只是商业工作的问题，而是当年整个经济的问题，这就需要考虑这个年份以及几年里建设方针是否妥当。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二年搞调整的时候，根据周总理、陈云同志、先念同志的意见，起草了一个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受到了批评，说这个决定是就商业谈商业，不是从生产出发来谈商业。现在看来，恐怕这个批评不太妥当。因为文件中反映出来的陈云同志关于商业工作的观点，是从整个国民经济情况出发，从整个建设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商业应该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经过了几年的大跃进，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我们所能负担的程度，因此，就不能不多发票子。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当时的问题，结果就造成生产下降，商品供应减少，通货膨胀。文件提出要稳定市场，要把多发的票子收回来，这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出发的。至于具体的办法，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就是几个高价：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馆。在这以前，我们的粮食是出口的。陈云同志说，为了稳定市场，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要下定决心进口一部分粮食，而且这要下决心进口一些棉花，织成布，一部分供应国内，一部分出口，赚取外汇，来购买粮食。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陈云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后提出来的。后来计算，光是几个高价商品就收回了五十多亿，加上生产逐步恢复和其他的措施，很快就把多发的六十多亿钞票收回来了，使市场流通的货币同当时商品的供应互相适应，随之市场也就稳定了。采取这么一些措施，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和购买力的增长速度，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从而把生产和流通互相衔接起来。这就不能够说这是就商业谈商业，不能够说这不是从生产出发来谈市场。恰恰相反，这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

一的原理的运用。

陈云同志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生活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商业关乎六万万人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这些通俗的语言，所包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饭吃，画饼不能充饥。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充饥吗？也不能。列宁主义所以灵，就是因为有它的指导下，我们能够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的日子过得好，而且过得愈来愈好。商业工作同人民有着极其广泛、深刻的联系，是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所以，值得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不仅商业部门要重视，就是搞生产的同志也要重视。因为商业工作，市场问题，是同生产密切联系着的，所以，从市场上反映出来的意见，实际上就是群众对我们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意见。市场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不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现在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一致了。不论流通领域还是生产领域，价值规律都起作用。因此，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至于整个经济情况，能够在市场上得到最灵敏的反应。外国学者不是讲要注意市场机制吗？有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到中国来访问，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搞得不好，最需要的是信息。市场经济的最大优越性，就是信息灵通。他挖苦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挖苦我们的计划经济，毛病就是信息很不灵通。如果在基层有十个消息，一层一层地转到上面，这做消息就等于零了。这个批评是很挖苦的，但也确实看出了斯大林这个理论的毛病，也看出了我们根据斯大林的

理论所实行的这种经济体制的毛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对于国内市场的情况、世界市场的行情，是很了解的。通过电报和计算机等等，很快就能反映到总公司，总公司就可以很快地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决策。

陈云最近说，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消息灵通，反应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大局。陈云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

我们要搞好经营决策，也要很好地重视消息；而得到消息最快的一些部门，就是商业、金融以及财政。事实证明，发现我们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的，往往首先是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陈云同志最近说，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消息灵通，反应灵敏的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陈云同志以前比较多的时间是管财贸工作，他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过去人们常常把做商业工作和做财政、金融工作的同志，看成是右倾保守观点的代表。这是因为过去我们老是不量力而行，搞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而根据商业、金融、财政部门的信息，我们的指标却实现不了，速度也实现不了。他们要求建设慢一点，指标低一点，结果同那些想快的人就意见不一致；想快的人就把这些同志、这些部门看成右倾保守了。根据过去的经验，以至于这次调整的经验，也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们要改变多年形成的这种习惯看法，再也不要把商业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的同志统统看成是什么保守倾向的代表。不能说商业部门、财贸部门里没有一个有保守观点的人，但把他们统统看成是右倾保守不合乎实际。有保守观点的人，搞生产的人当中也照样有；不能说搞生产的人统统都没有保守思想。实际上，财

贸部门比生产部门更了解情况，例如，哪种商品脱销了，哪种商品积压了，百货公司都知道；今天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财政局和财政部都知道；今天存款的多了，还是取款的多了，银行都知道。所以，财贸部门和财贸工作人员的意见，对于管生产、管建设的同志来说，是不应该忽视，也不能够忽视的。他们的发言权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过去讨论计划的时候，这些部门的发言权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这个情况也必须改过来。

我们是企业管理协会，我觉得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根据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把企业管理好，必须既了解生产过程，又了解流通过程。搞工业的也要同时了解商业，办工厂的也要同时与商店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要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样，把管理和经营密切地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一步。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6月15日）

认识我国国情的一些参考资料

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赵紫阳同志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所以多次跌跤子，犯“左”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说明我国实际的国情，现在整理一个资料，供参考。

一、人口多，消费大

我国总人口（不包括台湾、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下同），一九五〇年为五亿五千多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四亿六千万人。到一九七九年，达到九亿七千多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八亿一千多万人。三十年来，平均每年净增一千四百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一百六十多万人。最近两年，由于强调计划生育，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今年预计将下降为千分之十点五。但是，今后几年，由于育龄夫妇增多，出生率将会回升，一九八二年总人口肯定要超过十亿。

据统计局计算，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每人按二百五十元计算，约需增加消费基金三十亿元。

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口，按每人口粮五百斤原粮计算，需增产粮食六十亿斤；按每人用布二十五尺计算，需增产布三

亿尺，即需增产棉花（或化纤）四十万担。

二、农业资源并不丰富

我国土地总面积一百四十四亿亩，仅次于苏联，与加拿大、美国差不多。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十四亩五分，不仅大大低于苏联、加拿大、美国，也比世界平均每人四十九亩低得很多。

在土地总面积中，可以用于农业、林业、牧业的面积，约为六十六亿五千万亩，占百分之四十六；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亩六分，为世界平均每人三十三亩的五分之一。

我国耕地面积，统计数为十四亿九千万亩，平均每人一亩五分，远远低于人少地多的国家，也低于人多地少的印度（平均每人四亩左右）。即使按美国卫星照片的测算（共二十二亿亩，人均二亩二分多）或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共十九亿亩，每人不到两亩），也只有印度的二分之一，比世界平均每人四亩多要少一半。

我国现有林地面积约十八亿亩，每人平均一亩八分多，仅为世界平均水平（十五亩）的八分之一。我国现有草原面积约三十三亿六千万亩，每人平均三亩四分，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十亩多）的三分之一。即使大力造林、种草，也要相当的时间和一定的投资。

我国不仅按人口平均的可利用的农业资源严重不足，而且现有的农业资源也遭到很大的破坏。许多农业科学家提出，我国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生产上，实际上对自然资源采取了掠夺性的经营方式，破坏了生态平衡。特别是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据大略估计，每年约有五十多亿吨泥沙流入大海，其中含氮、磷、钾肥约四千万吨，超过我国一年的化肥施用